

后危机时期的根本出路：科技创新

李 扬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后危机时期：金融与技术创新”，这不仅是当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的热点问题，同样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至少涉及3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一，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赞同“后危机时期”的说法，也赞成用不确定性非常强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从2009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形势，还是从中国的经济形势来看，它们都已经走出了危机最困难时期，并出现了恢复的迹象。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还在恢复的边缘中摇摆。全球经济要彻底从这次危机中走出，尚需时日。对此，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一方面，造成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各种因素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看到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联合行动对世界经济进行积极救助，其力度同样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是迅速控制住了汹涌而来的危机的蔓延，避免了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大规模的救助行动中，导致这次危机的很多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暴露和有效消除，如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次危机从一个层面上看是全球经济失衡，世界各国经济都处于失衡的状态：一些国家长期贸易顺差，另一些国家则长期贸易逆差；一些国家长时间高储蓄、低消费，另一些国家则长时间低储蓄、高消费；一些国家外汇储备激增，另一些国家则“债台高筑”。在本轮危机中这样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解决。又如南北经济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占有资源的不平等、国际话语权的不平等、国际金融体系运作的各种方式及结果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也依然没有消除。

另一方面，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造成危机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反危机措施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只要这两类问题得不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全球经济从危机中走上复苏之路是没有根据的。在我看来，至少有3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在这次危机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危机之前大约是9000亿美元，危机最深重的时候达到了3万亿美元，现在维持在2万多亿美元左右。如此大规模地向市场投放资金，对于解救危机是个强心剂，但是对于未来恢复增长可能就是一个障碍。所以，在当前经济增长和就业都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却又不得不谈所谓通货膨胀问题、结构失衡问题。不仅如此，现在金融业又活跃起来了，一些金融机构又在毫无节制地大肆花钱。二是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政府债务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对此问题应当是比较敏感的，因为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收支。应对危机措施实施后，多数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恶化，各国财政赤字及相应债务都在膨胀。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政府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甚至还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如当前的爱尔兰。三是整个经济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危机之前，世界是有秩序的，或者是市场秩序，或者是政府调控的秩序，或者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秩序，总之是有规可循的。危机开了一个“相机抉择”的先例，到目前为止，世界多数国家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依然缺乏一个可以依赖的稳定的体制和机制，这也给经济迅速恢复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二，金融是全球经济彻底走出危机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领域。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过去一个时期金融部门过度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矛盾积累的总爆发。所谓过度发展，就是指它已经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基点，进入了自我膨胀的境界。特别是一些金融产品经过多级衍生后已经具备了自我膨胀的动力，以一种几何级数增长，导致了泡沫的出现。还包括影子银行以及表外业务等。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还是在用饮鸩止渴的办法来暂时掩盖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监管缺失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造成这次危机的金融因素尚未消除，如货币政策渐失效率、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危机、基于各国金融结构之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以及金

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疏远化的倾向等。

负债率过高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都采用了大量极端性的措施，对金融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膨胀了很多倍。其中，中国是膨胀最少的，但也达到了40%以上，美国则膨胀了2倍以上。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涌入资产市场，诱发未来形成泡沫的可能。前不久发生的迪拜事件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资产负债表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危机依然可能会在某处发生。中国也需要重视这一情况，目前5张资产负债表都出现了问题。它们分别是居民的、企业的、金融机构的、政府的、国家的，其中前4个我们必须要大下大力气认真加以解决。

这两年有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发展，叫作宏观审慎监管。过去我们都认为监管是微观的事情，现在看来，应该上升到宏观层面。从宏观平衡、宏观稳定的角度再加上审慎原则的有机组合。审慎意味着杜绝了比较过激的政策。如果我们要约束信贷，监管有很多现成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另一个就是提高金融机构的拨备覆盖度，这是更加审慎的监管制度。通过监管，通过审慎原则的实施，是导致宏观经济稳定的很好的一个路径。传统的货币经济学是不涉及上述问题的。传统的货币政策是不顾及结构的，但是结构问题显然非常重要。所以，后危机时期金融领域面临创新与改革的挑战。

第三，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根本复苏的动力。今天我们讨论后危机的时候，就是要思考我们什么时候能彻底走出金融危机。我想从我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个看法，我们要依靠创新走出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大规模的科技创新。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对这次危机的分析。我认为这次危机表现在金融领域，其实质是经济危机，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基础一定在科技上。所以我们的判断是这次危机的实质是科技基础丧失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之前，我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推动这一时期高速增长的原因有3个。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使得经济增长周期进入上升阶段。二是全球化导致全球分工重组，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带着极其低廉的成本融入全球经济的分工链中，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三是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3个因素导致我们有一个新经济。这次危机经过了一段波折最终爆发，所以恢复就不会很简单。因此，我认为未来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科技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创业活动。

中国政府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智慧，在推出4万亿人民币的应对措施的同时，启动了16项科技专项。这些科技专项都属前沿，哪一个成功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创造企业的机会。中国政府对于经济长期发展、应对危机有一个很重要认识，就是要发展新的科技和新兴产业及技术，能源、传感网与物联网关键技术、微电子和光电子、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科学。其中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我们最终走出“后危机时期”最根本的措施。

哥本哈根会议后，低碳经济成为一个热点概念，大洋彼岸已推出了低碳经济。对于低碳经济我们是支持的，但坚决反对以此来限制我们的经济发展。尽管低碳经济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流行，如果抛开其他因素，单从经济角度看，低碳经济概念为经济发展方式和科技创新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但我们对它的另一个目的，即限制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保持警觉。

在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同过去相比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不断改善的经济和金融结构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抵御危机冲击的能力，也为其应对危机的政策调整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尽管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且阴云持续不散，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与1982年债务危机及此后该地区经历的数次金融危机相比，这场危机对其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要小于人们的预期。尽管在目前世界经济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我们还很难说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完全摆脱了危机的阴影。但是，我们看到了它们在金融和技术创新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中国同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的学术界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总结双方在应对危机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后危机时期金融与科技创新的政策，这对加快经济恢复的进程是有益的。未来的科技创新将为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开辟新的领域，同样也为我们双方的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需要我们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为各自政府提出积极有效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关系的全面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